

张岂之 主编
刘惠琴 著

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717212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

刘惠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刘惠琴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24-06254-5

I. 北... II. 刘... III. 儒家—研究—中国—北朝时代 IV. B23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103 号

书 名: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

作 者:刘惠琴 著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32 开 7.25 印张

字 数:158 千字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7-224-06254-5/B·181

定 价:15.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电话:7205197)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的“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就西北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

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魏晋以来儒学的存在状况	(1)
第一节 经学的危机与衰落	(2)
第二节 纪学的变迁与发展	(10)
第三节 玄学及其与儒学的关系	(15)
第二章 北朝儒学经学的发展存在状况	(25)
第一节 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官学经学的发展	(26)
第二节 北朝的私学讲授及师承	(37)
第三节 南学与北学	(51)
第三章 北朝士族及士大夫的历史贡献	(58)
第一节 北魏前期汉族士族对汉化的推动	(61)
第二节 北魏后期汉族士人的作用与汉化进程的加快	(79)
第三节 北齐、北周时汉化的反复及士人的汉化努力	(97)
第四节 北朝士族的家学门风及士族的社会影响	(116)

第四章 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深入社会	(136)
第一节 北朝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社会	(138)
第二节 北朝时期法律的儒学化	(150)
第三节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158)
第五章 北朝佛、儒、道之间的斗争与融合	(168)
第一节 太武帝灭佛与胡汉之争	(170)
第二节 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造	(179)
第三节 北方三教共存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189)
第六章 隋代经学的统一与王通的新儒学	(202)
第一节 隋代经学的统一	(202)
第二节 王通及其新儒学	(208)
结束语	(217)
参考文献	(220)

第一章

魏晋以来儒学的存在状况

东汉末期,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经学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走到了尽头,以章句训诂为主的繁琐经学衰落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纷相竞起。在汉末各种社会思潮中,以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的复归为主流,形成社会批判思潮,其着眼点为拯救时弊,即汉末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危机,儒学作为长期以来政治指导思想却无所作为,当时之有识之士便援引名法及黄老思想补充儒学之足,企图整伤政治。

新思潮一发便不可收拾,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沿其内部逻辑演进,发展成名理思潮之玄学思潮,并迅速发展成为魏晋时代之主流思潮。玄学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外来学术佛学相结合,不仅推动了佛教及佛学的发展,也使得玄学本身佛学化。相对而言,儒学的发展则进入一低谷时期。这一时期儒学所表现的特点是: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儒学其独尊状况虽然受到冲击,然而仍然保持了正统地位,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学术形式自汉末衰落以来,魏晋时仍然不振。其表现为:首先,经学不受

官方及士大夫们所重视,官方经学——学校,失去了学术中心地位,一衰再衰;其次,两汉以来标志经学兴盛的师说传承、家法林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各种师说、家法丧失殆尽,经学传承苟延残喘,不绝如缕;再次,玄学与佛学的崛起,冲击儒学经学传统,玄学经学是对旧经学的反动。

经学虽然衰落不堪,但其作为官方正统学术的地位得到保持,在冲击与曲折中寻求发展。首先,经学以章句注疏的形式在学术上依然传承不断;其次,逐步肃清了谶纬神学的影响,向理性方向发展;再次,魏晋时期经学著作间有所出,在内容上有所创新与突破,显示出经学内部寻求发展的尝试与努力。

玄学是魏晋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在社会、政治、学术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意义深远。玄学的产生为中国传统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玄学以《易》、《老子》、《庄子》为主要研习经典,在思想上突破了许多旧的传统,树立了本体论的新理论,在中国哲学发展、思维演进方面,取得很大发展。然而在玄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尊孔子为圣人,为最高之理想人格,也无法否定儒家之纲常名教思想,而是企图调和其所崇尚的自然与儒家名教的关系,证明名教的合理性。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大变动、大调整,并没有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学的基本观念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第一节 经学的危机与衰落

东汉后期,儒家经学开始显现出衰落迹象。在经学内部,自汉武帝表彰五经、确立其独尊地位后,经学迅速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东汉时期经学自身的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学的谶纬神学化。谶纬之学自王莽及光武帝的宣传利用后,迅速蔓延,也影响了经学,导致经学谶纬化,使得经学中充斥着各种迷信、怪异、神秘的内容,进而将经学庸俗化。第二,经学的繁琐化。汉代经学株守师说家法,代代传业,形成枝叶滋蔓、章句繁琐的状况,动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繁琐的章句训诂之学,势必导致经学整体上的支离破碎,而造成学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①,即所谓“皓首穷经”的困难局面。第三,经学的歧义化。汉代经学重师说家法,一经有数家之分,一家又有数说,学者严守门户。而章句繁琐,支离破碎,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不能统其大意,在一经中各家师说家法纷异,经学严重歧义化,在理论上无法贯通。由此可见,经学在其发展的繁盛中,自身内部已经孕育着危机。汉代经学的以上发展倾向,使得经学日益脱离实际,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找不到其进展之路与发展方向。

同时,汉代官方经学也显示出衰落之态。自汉武帝置太学,立五经博士,教授学生,以经学取士以来,官学的发展高潮迭起。经学各家师说争入官学,博士名额也一增再增,东汉时达十四家。太学生队伍不断扩大,由汉武帝初置时的五十人,逐步增加至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可见官学经学发展之盛,其规模一扩再扩。并且,太学形成经学之学术中心,国家尊崇官学,在太学中领众教授之博士,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很高,导致汉代时各家师说争入太学,有志少年也往往游学太学,形成太学在全国经学中的学术中心与领导地位。但到东汉末期,官学开始衰落,史载:“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顺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帝时学虽增盛，“而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衰矣。”^①

官学的衰落是经学发展内部危机的表现，同时也是官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官学繁盛的表面之下，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利禄的诱引。朝廷以官禄而劝学，民众以利禄而习经，官学成为登进荣显之阶梯。因此，“儒之途通，而其道亡”。太学生不以道德修养、砥励志尚为习经之目的，而志在仕途之显贵。东汉末期太学生虽增盛至三万人，而不能以学业为务，只是朋党交结，浮华相尚。官学的变质使得不仅没有发展前途，而且脆弱不堪，一遇变故，便颓然而溃。在东汉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官学更是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在儒学外部，汉末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冲击儒学独尊地位，造成儒学统治的危机。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皇权失驭，朝政日趋颓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得不到解决。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现实，西汉以来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学说为主的经学思想一筹莫展，其所宣扬之谶纬、灾异得不到验证和实现，无法对现实社会政治矛盾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于是在士大夫阶层中，一些忧国忧民之人，试图从儒学外部来寻找能拯救时弊的方法和理论，来弥补儒学不足。王充、桓谭、扬雄、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都著书立说，批判现实政治，形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在他们的著作中，严厉批判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揭露了谶纬神学之荒谬。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大多借用了黄老、名法思想来充实改造儒学，于是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学术大变革、大发展的序幕，从而使传统的章句注疏式的旧经学更加衰落。

^① 《后汉书》卷 79《儒林传》

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在官吏选举中以察举和征辟为主,以经明行修的儒学名教来评判取士。但在东汉末年,名教之治发生动摇,朝纲颓弛、政治日益腐败,名教不能维系人心,选举名不符合实。因而,乡间清议的人物批评开始受到重视。在清议的推动下,品评人物、循名则实的名学发展起来,清议逐渐转向清谈,其内容由品评人物转向名理之学再转为玄学清谈,于是名理思潮、玄学勃兴,士大夫们的兴趣日益转向新学,这也导致了传统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的趋势没有改变,汉末时期官学——太学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私学的教授传承仍在继续。郑玄遍注群经,兼采名家之说,融通古文、今文之学,打破了师说家法门户标立、各不相通的局面。郑玄遂成为一代大儒,由此而出现的郑学成为汉末到魏晋经学的圭臬,而其他各家师说家法式微,至魏晋后丧失殆尽。

魏晋时期,《易》学发达,然而汉代立于官学的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京氏(京房)之《易》传习甚少,日益失传。梁丘、孟氏之《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之《易》学,到南北朝时期亦是有书无师。汉代流行民间的费氏《易》,汉末较盛,马融传其学,后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曹魏时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费氏《易》而成为魏晋《易》学之主本。其中二者的区别为:郑玄之《易注》,仍株守汉代象数《易》学之特色;而王弼则承扬魏晋学术之变迁,成就《易》之义理化、玄学化的新学——玄学经学。其他汉代各家师说尽亡。

汉时《尚书》有欧阳氏(欧阳高)、大小夏侯(夏侯胜为大、夏侯建为小)三家并立官学。孔安国所述之《尚书古文》之学并未立官学。但后郑玄为《尚书古文》作注,杂以今文,并非仅为孔安

国旧文,一时盛行。至西晋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东晋时,梅赜献伪孔安国古文《尚书》。至南北朝时所行《尚书》,北方以郑玄注为主,南方仍以伪孔安国旧传为宗,其他师说绝亡。

汉代《诗》有:《鲁诗》,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而作训诂;《齐诗》,齐人轅固生所传《诗》;《韩诗》,燕人韩婴所传,三家并立于官学。另有《毛诗》传承于民间,至汉末《毛诗》兴盛,郑玄作《作诗笺》。《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魏晋至南北朝时虽存而无师传,只有《毛诗郑笺》魏晋时留存传承。

《礼》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发达。汉时,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三家并立学官。又有《周官》于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汉末马融传小戴《礼记》,又有所编定,同时作《周官传》。郑玄受业于马融,郑玄作《周官注》及《小戴礼记注》,并注《仪礼》十七卷。魏晋时,《礼》学大盛,均以郑玄之学为宗,而其他师说家法并多散亡,或无师传。

东汉时《春秋》之学,《公羊》有严氏、颜氏两家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于学官,而《左氏春秋》则流行于民间。汉末,何林作《公羊解说》在魏晋时流行于北方。《左氏春秋》汉末有贾逵、服虔并为训注,服虔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流行北方。西晋时,杜预著《左氏集解》,至东晋在南朝流行于工。东晋时范宁还撰有《春秋穀梁传集解》。但总体来说,魏晋时期惟有《左传》师传习读较盛,《公羊》、《穀梁》少有能通其义者。

《孝经》在汉代有古、今学之分,后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郑众、马融并为之注,相传亦有郑玄之注本。孔安国注本亡于南朝梁时。

《论语》汉代有《齐论》与《鲁论》之说,后又有古文《论语》,孔

安国为之作传。郑玄以《鲁论》之《张侯论》(张禹所删定之本)为本,参考《齐论》和古文《论语》而为之注。曹魏时何晏又作《论语集解》,《齐论》遂亡。南北朝时,郑玄注流行于北方,何晏注流行于南方,其他师说殆尽^①。

由上可见,汉末至魏晋以来,经学师承虽传延不断,然而汉代以来师说纷立的局面彻底结束,各家学说纷纷走向衰微之路,灭绝殆尽。许多连本而亡,少量留存者有书无师。世所传承者以汉末之郑玄学说为主,杂以魏晋新出之注。然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传授规模、习经人数上都大大下降,无法与汉代相比。因而,经学的衰落不待自明。

自东汉末年官学太学受到党锢之祸重创后,一蹶不振。魏晋时,学校式微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扭转,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是一衰再衰,以至学术中心也由官学转移至私学。特别是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开始形成,世家大族重视家学传承,学术转入家内。官学成为统治者徒应故事、附会正统之工具。往往在王朝初建时,建学置博士,以象征其正统所在,但不能坚持,一遇变故,就废而不存。朝廷既不重视,当然也无劝学奖掖之举措。此非登进之途,士大夫亦不以经学为务,学校不兴,当在情理之中。

如曹魏时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然而却是“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②可见太学虽立,而博士粗鄙、生徒不精、学业不劝,徒具文饰作用,因而经学自然不振。此后,西晋武帝于咸宁四年(278)立国子学,晋

① 以上均参考《隋书》卷32《经籍一》

② 《三国志》卷16《杜畿传》,裴注引《魏略》。

代学校分国子学与太学两级以别贵贱,置博士十九人,教授生徒。然而西晋世风专以玄学清谈为时尚,劝学之举亦有名无实。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学校更是废弛不修,经业亦不能振兴。官学的衰落不振、不受重视,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儒家经学衰落不振的状况。

同时,魏晋也是一个学术变迁的时代。这一时期,玄学开始发展兴盛起来,这为中国思想学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玄学的兴盛也造成了儒学经学的危机与衰落的加深,因为从根本上说,玄学是对汉代以来繁琐章句经学的反动,因而对这一时期传统儒家经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十分巨大。

玄学之发端,一方面起自经学内部《易》学的发展变迁。汉末《易》学的发展中出现言性与天道、注重义理研究的《易》学“新经义”派,即荆州学派,以宋忠《易》学为代表,另有虞翻、荀爽等。有别于旧的汉代传统的象数之学,他们喜张异议,删芟繁重,是东汉以来新学之发端。王弼之学与荆州之学有着密切关系,是新学之延展^①。

另一方面,汉末之清议,即人物品评之学于汉魏时形成名理思潮。名理之学,品评辨别人物,要求循名则实,改变汉末选举名不副实之状况,并破除一些刻情修容、伪行沽名的虚伪人物,因而识鉴人物极其精微。识鉴人物要求不以形貌皮相而在得其神理,遂成为只可意会不能言宣之体识,而言意之辨起于识鉴,而玄学系统的建立有赖于此^②。这样,清议遂发展为清谈,助长了玄学理论之发展。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p.85。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p.27。

玄学以研习《易》、《老子》、《庄子》为主,总称三玄。讨论本末、有无、体用问题。王弼通过注《易》,建立起本体论,这比之汉代宇宙构成论在哲学思辨上迈进一步,取得了发展。然而玄学重天道性命,其研习经典,大异于经学,对传统儒家经学无疑是一打击。玄学还重抽象的玄理,对儒学中的主要内容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则视为末端,因而不受重视。儒家经典亦遭轻视,史载:

“(荀)粲诸兄并以儒术议论,而粲独好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而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①

这种玄风盛行、注重天道性命,而以儒家典籍六经为圣人之糠粃、先王之陈迹的看法和倾向,真实地体现出魏晋时代玄学兴盛及对儒家经学的冲击。

玄学对世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亦十分巨大。这一时期,士人思想解放,自由主义、浪漫主义高涨。他们不遵守儒家礼法,性率任达,狂简放荡,与汉代士人经明修行、以儒家名教礼法为行为准则来博取名声的情形大相径庭,形成强烈对比。魏晋士人不仅行为放荡,而且在学术生活中喜尚清谈、讨论玄学名理诸问题。在政治生活中,不以世务婴心,鄙视实际政治事务,专以清谈高论为尚。士人之清谈聚会、通脱放达之事在《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可见,玄风畅演对人们观念心态影响巨大,在思想上冲破了旧学之樊篱,形成一时之思想解放运动,对汉代以来儒家之名教思想统治提出挑战,使儒学的统治地位出现危机。

① 《三国志》卷10《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彧传》。

第二节 经学的变迁与发展

魏晋时代玄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使得自汉末始衰的经学更趋势衰落,然而,汉代旧经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儒学经学仍保持传延不绝,并间有新作出世,处于缓慢发展及选择调整过程中。经学的玄学化,即玄学经学,就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探索向义理化方向发展的尝试,是儒家经学调适发展的表现。

汉末,官学经学衰落,各家师说式微,但民间私学讲授仍然有所发展。郑玄作为汉末经学大师,兼采今、古文之学,参合融通各家师说,遍注群经,蔚为大家,成就了其一代宗师之经学学术权威地位,自魏晋至隋唐,经学无不受其影响。因而在魏晋时期,在经学发展上,依然以郑玄学为宗,郑学被习经者奉为圭臬,形成经学主流。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仍然有人敢于挑战权威,树立新义,这就是王肃。这在客观结果上,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一、王肃及其经学

王肃为曹魏司空王朗之子,他不但通经,还著有《易传》,史载,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①王肃遍注群经,企图建立自己的经学权威。其经学的特点,首先是以贾逵、马融之古文经学为本,综合郑玄之学及兼采古文、今文,为混淆家法、打破师说之综合经学。其次,王肃经学十分注重礼学,这与时代正好和拍,是

^① 《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